

Principl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文学地理学原理

梅新林 葛永海 著



(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rinciples of
Literary Geography

文学地理学原理



扫一扫
获得更多新书信息

ISBN 978-7-5203-1375-9



9 787520 313759 >

定价：258.00元（全二卷）

目 录

下 卷

第七章 文学地理学的路向选择	(569)
一 路向选择依据	(570)
(一) “四个传统”理论的有益启示	(570)
(二) “四重空间”重构的内在需要	(573)
(三) “四大层次”集成的前沿方向	(577)
二 传统研究之路	(581)
(一) “地域文学”与“区域文学”之辩	(582)
(二) 中西“地域研究”的传统与取向	(590)
(三) “地域—区域研究”的转换与困境	(599)
(四) “地域—区域研究”的突破方向	(614)
三 新兴研究之重	(647)
(一) “空间研究”的新增长点	(647)
(二) “空间研究”的突破方向	(675)
(三) “传播研究”的后发优势	(690)
(四) “传播研究”的突破方向	(704)
四 未来研究之势	(720)
(一) “新组合”之趋势	(721)
(二) “新技术”之趋势	(725)
(三) “新媒介”之趋势	(740)
五 三向交互效应	(744)
(一) “三向交互”的文化引领	(745)
(二) “三向交互”的突破方向	(752)

第八章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759)
一 “二元研究法”	(759)
(一) 跨学科方法的多元取向	(761)
(二) 科学—审美的二元复合	(767)
二 “地→文” 范式论	(769)
(一) “地→文” 范式论的探索历程	(769)
(二) “地→文” 范式论的三种方法	(780)
三 “文→地” 范式论	(799)
(一) “文→地” 范式论的探索历程	(799)
(二) “文→地” 范式论的三种方法	(808)
四 跨界对话机制	(853)
(一) 双重范式规约论	(854)
(二) 双重范式协同论	(859)
(三) 双重范式重构论	(868)
第九章 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地图	(878)
一 “三种形态演变”	(879)
(一) 三种历史形态	(879)
(二) 双重学术取向	(893)
二 “空时” 坐标	(898)
(一) “空时” 坐标的理论基础	(899)
(二) “空时” 坐标的“五化”组合	(904)
三 “图文” 结构	(908)
(一) “图—文” 关系的重构	(908)
(二) 文学地理的“图像化”	(909)
(三) 地理图像的“文学化”	(912)
(四) “图—文” 结构的三重境界	(917)
四 “互文” 功能	(921)
(一) “文本” 释义系统与功能	(921)
(二) “图本” 释义系统与功能	(926)
(三) “文本” — “图本” 的互文功能	(930)
五 双重“语言”论	(935)
(一) 双重“语言”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	(935)

(二) 文学地图的价值定位与突破方向	(953)
第十章 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学	(965)
一 分途与同趋	(965)
(一) 第一回合的分途与同趋	(966)
(二) 第二回合的分途与同趋	(968)
二 资源重整	(970)
(一) 资源重整的层序性	(972)
(二) 资源整合的数字化	(987)
三 范式重构	(993)
(一) 时间主导型的空间发现	(993)
(二) 空间主导型的时间变型	(996)
(三) 时空交融型的范式重构	(1001)
四 意义重释	(1007)
(一) “神话考古”的启示意义	(1007)
(二) 从“神话考古”到“精神考古”	(1011)
(三) 意义重释与“对位互读法”	(1017)
五 新体文学史	(1024)
(一) 世界文学观	(1025)
(二) 时空互化论	(1029)
(三) 图文合体论	(1035)
(四) 模型重塑论	(1048)
参考文献	(1087)
后记	(1139)

下 卷

第七章 文学地理学的路向选择

第五板块——“研究路径”由第七、八章组成，主要包括研究视角与方法两个层面，前者重点关注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后者则重点关注如何抵达的问题。综合地理学的“四个传统”理论的有益启示、文学地理学“四重空间”重构的内在需要以及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的“四大层次”集成前沿方向，这里拟从传统研究之路、新兴研究之重与未来研究之势三个维度，重点讨论一下文学地理学的路向选择问题：传统研究之路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人地关系亦即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然后由人地关系的垂直关系与水平关系分化为“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由于人地关系是地理学最为本原的核心之所在，与此相对应的“地域文学”研究，也同样在传统文学地理学中具有基础性与本原性意义。由“地域文学”趋于“区域文学”研究，主要聚焦于区域人地关系的文学化形态与结构，探讨区域文学分布、变化、聚集、扩散的轨迹与规律，在传统文学地理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新兴研究之重，集中体现在“空间研究”（狭义上意指文本空间研究）与“传播研究”，前者因直接受益于“空间转向”与“空间批评”的刺激和推动，于20世纪70年代异峰突起，进而衍为新的学术主潮；后者直承“空间研究”，并最终完成文学地理“四重空间”的复合循环（详见第五章），所以居于收官重组的重要位置，但长期以来受到学界不同程度的忽略，尚未真正实现文学传播与文学地理的相互对接与有机融合，但相信会逐步成为继“空间研究”盛极之后的另一个新的增长极。以上“地域”—“区域”—“空间”—“传播”之“四位一体”分属于传统研究与新兴研究路向，大致与“四重空间”相对应。未来研究之势主要呈现为基于“跨界创新”的新组合、新技术、新媒介三大趋势，并因此显示了文学地理学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以上三重路向选择之分合，不仅蕴含着文学地理学的历史逻辑与学理逻辑，同时也进而指向通过“三向交互”新型平台与路径的跨界融合与创新。

一 路向选择依据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路向选择”，重点关注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包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从基于而又超越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观之，可以作为其路向选择逻辑依据的主要有：一是地理学“四个传统”理论的有益启示；二是文学地理学“四重空间”重构的内在需要；三是文学地理学跨学科“四大层次”集成的前沿方向。当以上三者一同交会于文学地理学的有机融合之际，大致可以归纳和总结为传统研究之路、新兴研究之重与未来研究之势三重路向选择。

（一）“四个传统”理论的有益启示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路向选择”，首先是因受地理学“四个传统”理论的有益启示。由威廉·帕蒂森率先提出的地理学“四个传统”理论对于文学地理研究的路向选择具有首要的启示与引领作用，这是从文学地理学母体学科——“地理学”审视文学地理学的“路向选择”。

美国杰弗里·马丁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20章“创新与传统”中引入威廉·帕蒂森（William D. Pattison）于1964年提出的地理学的四个传统：（1）地学的传统；（2）人地关系的传统；（3）区域研究的传统；（4）空间的传统。帕蒂森认为虽然这四个传统在美国地理学的历史中都有所表现——作为西方思想遗产中持续发展的部分——但每一种传统都曾流行一时。^①其中地学传统在地理学专业建立起来之前，在研究者的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后则有人地关系的传统产生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期间出现了对人地关系的两种定义：“任何陈述，只要包含……一个非生物要素的控制和一个生物要素的反应之间的某些关系，那么就是属于地理学性质的陈述。”“地理学家……将他们的研究对象定义为只研究人和他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地理学应定义为一门人类生态科学。”而区域研究的传统在20世纪中叶的地理学研究中特

^① [美] 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0页。See W. D. Pattison, "The Four Traditions of Geography,"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 89, Iss. 5, 1990.

别受欢迎，它强烈地反映在下述论述中：“我们地理学的根本性定义是研究世界上的区域差异。”“地理学是……一种研究领域，它关注特定地区特殊现象间的种种联系，以及地区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最后，通过研究数学和运动，空间的传统在此后的时间中非常流行，其重要性体现在下列陈述中：“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关注空间和空间的交互作用。”“现代地理学着重于研究那些表现为类型和过程的空间组织。”接受上述哪种观点取决于学者自己的地理观。这些观点中的大部分既是创新，又是传统；每一种都表达了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整体概念的一个方面。^①以上四种传统中，第一个传统：地学的传统，产生于在地理学专业建立起来之前，是其他三个传统的渊源所在，因而对趋于独立的地理学而言应是后三个传统，而与文学地理学密切相关或者说作为文学地理学路向选择依据的，也同样是人地关系、区域与空间研究的三个传统。

然后至1973年，美国爱德华·塔阿菲（Edward J. Taaffe）在美国地理学者协会第69次年会上所作的主席致辞中阐述了帕蒂森的论点。^②塔阿菲分析了人地关系的传统、区域研究的传统、空间的传统三个观点的重合和差异，认为人地观点或生态学观点着重于人和地的自然或生物环境；不妨把空间观点说成对空间结构的研究，这样就为空间观点提供了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含义，否则被看作纯几何观点了；至于第三个观点可以有多种说法：地区研究、区域研究、地区相互关系、方志学或地区差异等。这三个观点有其重叠的部分，也有三足鼎立的部分（见图7-1）^③。

图7-1中央阴影浓厚的部分代表三者的叠置，可能包括所有地理研究的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凡是使用地图和包含任何环境参数的地区研究，都将归入这三者重叠的范围之内。这三个观点也能够分开来考察。空间过程的抽象研究归入空间结构而不归入地区观点；如果是综合广泛的资料研究某一国家，应归入地区观点而不归入空间观点；生态学研究可以在

① [美] 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0—611页。

② [美] 爱德华·塔阿菲：《论空间观点》，《国外地理科学文献选译》四，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编印，1980年，第1—14页。

③ 此图转引自金其铭、杨山、杨雷《人地关系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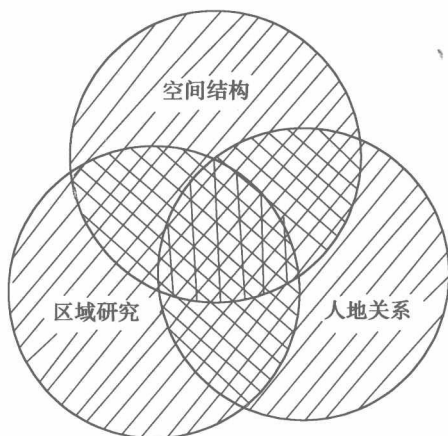


图 7-1 地理学的三个传统

无地图、无空间模型、抛开地区相关的情况下进行。

再至 1981 年，R. J. 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辞典》对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特征或者说它们的范围和侧重点作了简要解释，认为至少有三个特征可以加以说明：第一个特征是强调位置观点。在地球表面的自然形象和人文形象两个方面，地理学都重视位置或空间的差异。在人文地理学中，也可提出一些另外的更为合式或更为有效的空间类型。第二特征是强调人地关系上的生态观点。在这里，重点在于现象的相互关系，着重探讨某一地区内自然环境与居民之间的联系。在分析这种问题时，地理学者把他们的重点从区域间的水平空间差异转向于某一地区内的上下垂直联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联系可以是双行的（即人对地和地对人的双轨），而某一特定地区则可大可小，从全球到一个极小的地区。第三个特征是在进行上述空间位置与生态关系融合中的区域分析。地球表面上的一定空间地段称为区域，它是可以识别的，它们的内部及各区域间的形态和生态关系以及它们的对外关系是可以通过探索建立起来的。^①

以上所谓“三种观点”实际上是综合地理学学理逻辑与实践探索的结果，可以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路向选择”奠定最为基础的学理依据。

^① 以上参见金其铭、杨山、杨雷《人地关系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 页。

(二) “四重空间” 重构的内在需要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路向选择”，同时也是基于文学地理学“四重空间”建构的内在需要。借鉴 M. H. 艾布拉姆斯率先提出的“四大要素”理论与“空间批评”的分层理论而重构为文学地理学的“四重空间”，对于文学地理研究的路向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引领作用，这是从文学地理学母体学科——“文学”审视文学地理学的“路向选择”。

关于借鉴“四大要素”理论与“空间批评”的空间分层理论，然后重铸为“客体空间（世界）—主体空间（作者）—文本空间（作品）—传受空间（读者）”的“四重空间”的复合循环系统，已在第五章作了专题阐释，此无赘述之必要。现以此为基点，再就文学地理的“四重空间”与研究路向的“四位一体”关系以及传统—新兴研究转型路径略作讨论。根据这一“四重空间”的复合循环系统，传统的“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主要侧重于“客体空间（世界）—主体空间（作者）”的两重空间研究；而新兴的“空间研究”与“传播研究”则主要侧重于“文本空间（作品）”与“传受空间（读者）”的两重空间研究。由此可见，传统的“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向新兴的“空间研究”与“传播研究”的重心转移，不仅有助于“四重空间”重构的有序推进，而且有助于“四重空间”复合循环系统的最终完成。

当我们将“四重空间”的学理逻辑还原为“四位一体”研究的历史逻辑，那么可以划出“一大两小”的三个分界线，所谓“大”的分界线，即是以 20 世纪 70 年代“空间批评”的兴起为界，作为传统的“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向新兴的“空间研究”与“传播研究”的重心转移的分界线。由于“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主要分别对应于“客体空间（世界）”与“主体空间（作者）”，所以传统的“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仅限于文学地理学“四重空间”的前两个空间——“客体空间（世界）—主体空间（作者）”，而尚未广泛涉及后两个空间——“文本空间（作品）—传受空间（读者）”，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伴随“空间批评”的崛起才出现重要转机。与当时“空间批评”一跃成为引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主潮相契合，地理学的“空间研究”也随之取代“人地关系”“区域研究”而成为地理学研究的学术主潮。而在文学地理学界，则由源远流长的“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进而走向“空间

研究”，由文学地理学“四重空间”的前两重空间——“客体空间（世界）—主体空间（作者）”进而走向第三重空间——“文本空间（作品）”，这是文学地理学从传统研究走向新兴研究重心转移的关键转折点。

再看两个“小”的分界线：一是以20世纪中叶前后为界作为从“地域研究”拓展至“区域研究”的分界线；二是以世纪之交作为“空间研究”拓展至“传播研究”的分界线。但这仅仅是从大处着眼，而实际情况则更多的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关于第一个“小”的分界线，集中表现为“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的重心转移，与其母体学科——地理学的重心转移息息相关。上引美国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引录威廉·帕蒂森于1964年提出的地理学的四个传统时讲到区域研究的传统在20世纪中叶的地理学研究中特别受欢迎（详上文）。其实追溯以往从古代地理学到近代地理学转型，其中一个重要成果与标志即是区域地理学的成长与成熟。尤其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经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建者P. 维达尔·白兰士、德国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奠基者阿尔夫雷德·赫特纳、美国著名地理学家R. 哈特向等的积极倡导与鼓吹，大体至20世纪中叶前后，区域地理学（regional geography）终于衍变为地理学的主潮而盛极一时。^①与此同时，当时也有诸多区域地理学家参与了区域文学地理学研究，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地理系教授马克·布罗索在《地理的文学》一文中谈到，当时区域地理学家普遍将文学作为区域地理学的补充，旨在区域地理学内确立英语区域小说的文献价值（详见第八章）。^②另外，上文所论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由“历史地理学”与“区域特点”两大部分所组成，其中“历史地理学”侧重于“地域文学”研究，而“区域特点”则侧重于“区域文学”研究。费雷《文学地理学》的重心转向“文学地理学”的“通论”研究，但也同样以“地域文学”为基础兼顾并转换为“区域文学”研究，不仅在书中图22引录H. P. 蒂姆的《1800—1930 法国文学书志》（*Bibliographi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1800 à 1930*）中的“当代各省份

① 参见李旭旦《评哈特向著地理思想史论》，《地理学报》第10卷，1943年。

② Marc Brosseau, “Geography’s Literatu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18, No. 3, 1994.

文学比重简图”^①，而且对此作了意义阐释与正面评价，实际上即是法国区域文学分布研究，或许多少受到赫特纳和哈特向大力倡导区域地理学的影响，至少与赫特纳、哈特向大力倡导区域地理学的学术宗旨与理念比较接近。甚至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40年代法国迪布依《法国文学地理学》与费雷《文学地理学》两书的问世，终于宣告了文学地理学的正式诞生，充分印证了传统“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的演进趋势及其重要成果。

关于第二个“小”的分界线而论，主要表现在由“空间研究”拓展至“传播研究”，但较之第一个“小”的分界线的顺利转型似乎还存在不少问题，而且与文学地理学界以外的文学—文化研究存在一定的时间差。1998年，莫雷蒂《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既从欧洲小说传播地理提炼为“空间中的文学”的重要概念，又于第三章“叙述市场：1850年前后”对欧洲小说传播地图作了专题研究，并总结为“主流文学”“中心和边缘”“市场和形式”等理论模型，可以视为由“空间研究”拓展至“传播研究”的重要标志。但通观当今中西学界，尽管已有一些学者在文学地理的“传播研究”方面自觉先行，然而总体成果还相当有限，而在学术盛势上更难与“空间批评”相并观。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德国学者H. R. 姚斯、美国学者R. C. 霍拉勃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皆已输入中国，并迅速应用于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之中，然而却迟迟没有实现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对接与融合。另一方面，在文学地理学界，也普遍没有对此问题予以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可见包括文学地理学涉足文学传播与文学传播涉足文学地理学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当前“传播研究”的缺陷，也许正是未来新的增长点之所在。其实，就“四重空间”的复合循环系统观之，“传播研究”直承“空间研究”，居于收官重组的重要地位，由其最终完成文学地理“四重空间”的复合循环，所以缺少“传受空间（读者）”的“四重空间”是不完整的，而“传播研究”

^① André Ferre, *Géographie Littéraire*, Paris: Sagittaire, 1946, p. 70.

的弱化则更难以承担起收官重组的重要使命。只有从“文本空间（作品）”进而推向“传受空间（读者）”，而且只有到了“空间研究”与“传播研究”并盛局面形成之后，才能有效实现从传统向新兴研究路向的重心转移，也才能构成完整的文学地理学的“四重空间”复合循环系统。

在此还需要强调一下与本论题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时空差的问题，即中西的主潮兴替与重心转移并不同步。在传统的“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中，中国先行于汉唐时期，而西方则至18世纪之后后来居上；而在新兴的“空间研究”与“传播研究”中，西方始兴于20世纪70年代，而中国则在20—21世纪之交依然以传统的“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为主导，直至新世纪第一个10年之后，才开始全面启动传统—新兴研究路向的重心转移。二是共存性问题。从传统的“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向新兴的“空间研究”与“传播研究”的重心转移，并非意味着“地域研究”与“区域研究”的全盘退出，而由“空间研究”与“传播研究”包打天下。法国米歇尔·柯罗在《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一文中谈到：“近年来，有大量研究著述（博士论文、研讨会论文与科研论文）涉及在文学创作中的地理特征或者在文本中的空间再现。”^①前者意指传统的地域、区域文学研究，后者则意指新兴的文学空间研究，至少从法国文学地理学的现状可证“新兴”的正在勃兴，但“传统”的还依然在延续，彼此并行不悖。即便将来“传播研究”成为新的增长极之后，也同样无法垄断学坛。所以在传统的“地域研究”“区域研究”与新兴的“空间研究”“传播研究”之间，都有可能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但不可能至于“零存在”，因为这四者高度契合于艾布拉姆斯“四大要素”理论以及由此重构的文学地理学的“四重空间”，只要文学依然存在，“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四大要素”就会继续存在，文学地理学的“四重空间”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四位一体”研究也同样会继续存在。

^① [法] 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与地理诗学》，姜丹丹译，《文化与诗学》2014年第2期。

(三) “四大层次”集成的前沿方向

从威廉·帕蒂森率先提出的地理学“四个传统”理论，到 M. H. 艾布拉姆斯率先提出的文学“四大要素”理论，对文学地理学研究路向的选择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引领作用，同时根据从“四个传统”到“四重空间”的学理逻辑还原为“四位一体”研究的历史逻辑，我们大致可以将对应于前两个空间的“地域研究”“区域研究”划分为传统研究路向，而将大致对应于后两个空间的“空间（狭义）研究”“传播研究”划分为新兴研究路向。那么，当我们从传统研究路向、新兴研究路向转向未来研究路向之际，又该如何做出合乎历史逻辑与学理逻辑的预期与判断？我们认为还需回到由“文学”与“地理学”融合为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逻辑起点，即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融合与创新，既是其作为学科标志的特质所在，也是其赖以不断推进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的不竭动力；既奠定了传统研究与新兴研究路向的整体成就，同时也预示着重构为新组合、新技术、新媒介三大趋势的广阔前景。这是从文学地理学本身特点——“跨学科性”审视文学地理学的“路向选择”。

“跨学科”一词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其最初含义大致相当于“合作研究”。跨学科研究是近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但其意义绝不限于方法论，而是代表了学科探索与发展的动力和方向，在当今应对诸多学术难题严峻挑战中同时兼具战略与策略的重要价值。综观有关跨学科的讨论与争鸣，当以刘啸霆《当代跨学科性科学研究的“式”与“法”》所总结和归纳的“四大层次”最为到位。刘文认为，跨学科研究根据视角的不同可概要地分为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四个大的层次。其中，“方法交叉”有方法比较、移植、辐射、聚合等，这些通常发生在各学科之间，其中每一方面和环节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细致的内容。“理论借鉴”主要指知识层次的互动，通常表现为新兴学科向已经成熟学科的求借和靠近，或成熟学科向新兴学科的渗透与扩张。“问题拉动”是以较大的问题为中心所展开的多元综合过程，有纯粹为研究客观现象而实现的多领域综合，也有探讨重大理论问题而实现的多学科综合，更有为解决重大现实疑难而实现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文化交融”是不同学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一个

单独的过程，因为学科间的任何互动都有文化的因素参与，但真正的文化交融又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过程，是跨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①只是相对而言，理论借鉴比之方法交叉更为重要，应前置置于首要位置。下面即以“四大层次”结合文学地理学略作讨论。

一曰理论借鉴。在文学地理学的概念、学科、理论与方法四大支柱中，理论的核心与灵魂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无法撼动的。同样，未来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借鉴”也是如此。然而当前所要率先完成的基础性工作是对既有各种理论的盘点和整合。从第二章的地域批评、地理批评、地图批评与地理诗学，到第四章的版图复原、场景还原与精神探原，都是对原有文学地理学理论的重构与重释。比如关于“地域批评”，蕴含在罗伯特·戴诺特（Roberto Dainotto）的《文学中的地方：地域、文化与群体》（2000）、汤姆·鲁兹（Tom Lutz）的《国际视野：美国地域主义和文学价值》（2004）、罗伯特·杰克森（Robert Jackson）的《寻找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地域：现代性、异议与创新》（2005）、雷·安·达克（Leigh Anne Duck）的《国家的地域：南方现代主义、种族隔离与美国民族主义》（2006）、《批评地域主义：美国风景中的政治与文化的关联》（2007）^②等重要著作中的“地域批评”理论，迄今尚未得到系统的译介与阐释；而“地理批评”，除了法国贝特兰德·韦斯特法尔与美国罗伯特·泰利之外，还有诸多相关论著需要翻译与阐释；至于“地图批评”，相继产生于西方的“文学地图”与“文学制图”以及本土的“文学图志”理论也需予以辨析与融合。所有这些，都可以为未来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理论借鉴”提供新的起点与启示。

通常而言，跨学科“理论借鉴”同时表现为新兴学科向已经成熟学科的求借和靠近，或成熟学科向新兴学科的渗透与扩张，这两种情况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同时并存。文学地理学系由“文学”与“地理学”融合而成，同时始终伴随着其他N学科的多元参与，所以未来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理论借鉴”，首先应是直接向其母体学科——“文学”与“地理

① 刘啸霆：《当代跨学科性科学研究的“式”与“法”》，《光明日报》2006年3月28日。

② 参见刘英《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文学地域主义研究》（《国外文学》2012年第2期）、《文学地域主义》（《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